

一波三折的《辽史补注》出版过程

李勉

《辽史补注》成书历时半个多世纪,始撰于史语所时期,到陈述先生去世之前,方基本完成,又时隔26年才终于出版。所谓“好事多磨”。陈述先生在漫长的岁月里对这部书不断进行补充、修正,使之成为了一部集整理与研究为一体的巨著。

其实在此之前,该书曾有好几次可以出版的机会,都因种种原因搁置下来。《辽史补注》的撰著和出版过程,也是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。

陈述先生在《辽史补注》后记里写到撰著是书的起因:

述初读《辽史》时,尝置《辽史拾遗》、《拾遗补》于侧,觉有未安,随手查阅。后因翻检之便,遂合两者为一书。偶有新知,亦附注书眉,仅便于使用,初未有意成书。

在北海静心斋时,一日,友人姚从吾过访,见此册,问,吾兄将欲撰一新《辽史》?急应之曰:不敢不敢。当时吾实无此奢愿。但志在辽、金二史,则已略具方向。

北海静心斋,即当时中研院史语所所在地。陈述因受傅斯年看重,1935年毕业后即到史语所工作。《辽史补注》工作的正式开展,正始于此。现在还能看到本书早期的手稿,用的是史语所特制的稿笺,乌丝栏,半叶十行,中缝油印“补注”二字。另刻有“校注”专印。陈述将《辽史》正文逐字抄录,校注部分则先捺朱印,再用双行小字注于下。这显然已经是誊抄过的,若再有增补,则以蝇头小楷写于天头地脚,或另纸贴附。

“七七”事变之后,陈述随史语所内迁,先后辗转于南京、长沙、桂林、南宁、昆明等地,1940年底被金毓黻“借调”到侨居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,其间始终笔耕不辍。当时《辽史补注》书稿初就,曾与《辽金闻见汇录》(未刊)一起列入东北大学的出版计划,因呈请陈寅恪先生为作序:

……久与沦陷区隔绝,东北重分几省,已莫得闻;经济更无所知。且金先生只半年来三台,半年在重庆,印制设备,仅石印机一台。

远在后方,期以纸墨报国,



1991年在山西参加辽金契丹女真史国际学术讨论会

此书与《辽金闻见汇录》,均曾列入计划目录。因条理其类别,整齐成书。并以序例寄寅恪先生呈教,重承鼓励,亟欲早见此书出版。但卷帙较重,印制为难。《(辽史补注后记)》

陈寅恪当时刚刚脱离了困厄香港的处境,辗转抵达桂林,“途中得陈玉书先生述寄示所撰《辽史补注序例》,急取读之”,境遇所至,怀古而伤今,特赞同其宁详勿略之旨,寄望甚高。欣然为其撰序,称:“惟尚冀未至此身盖棺之日,获逢是书出版之期,而《补注》之于《辽史》,亦将如裴《注》之附陈《志》,并重于学术之林,斯则今日发声唱导之时不胜深愿诚祷者也。”

《辽史补注》虽列入出版计划,并获陈寅恪撰序,但当时因为《补注》一书篇幅较大,而战时物资短缺,印力有限,终未能印成。据陈述在另一篇文章里回忆道:

研究室附设两套石印机,一面编印《东北集刊》,一面印研究东北的专著如《东北通史》、《东北书徵》等,还承印东大的学报《志林》、《辽金闻见汇录》、《辽史补注》也排入过计划目录,实际无力印。又因研究室改为研究所,任务由研究东北转向一般教学,1942年我专任历史系教授兼研究所导师,印书的事就搁置了。《(求学自叙)》

书稿虽没能印制,但至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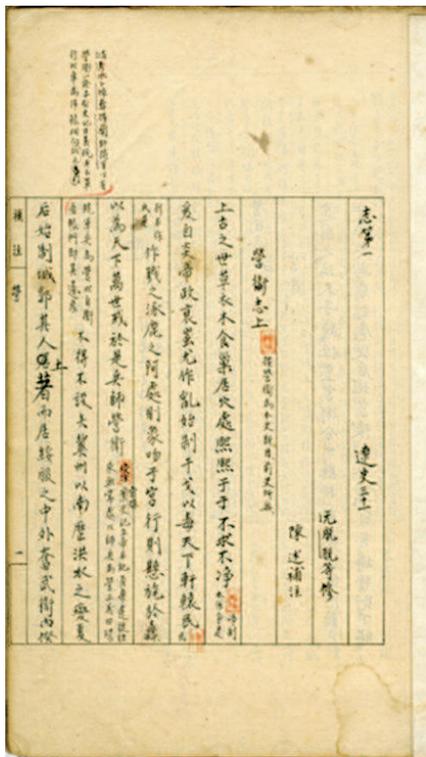
未毁于战火,已属不易。日本投降后,东北大学陆续从三台迁回沈阳,陈述“同全校人员别了三台,过重庆,顺江而东”,先到南京,再到上海,留在上海暨南大学、复旦大学任教,没有去沈阳。1947年,陈述回到北京师范大学,此时《辽史补注》又有一次出版机会:

友人聂崇岐小山、齐思和致中为言,哈佛燕京社存纸若干,欲排印此书。《(辽史补注后记)》

1951年2月,教育部接管燕京大学,次年高校院系调整,燕京大学被撤销,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公处也与燕京大学一起成为了历史,排印一事自也作罢。与社会的巨变相比,一部书的出版与否便微不足道了。

1949年下半年,陈述先生响应吴晗提议,发起成立了中国新史学研究会,又上天安门城楼见证了开国大典。他的辽史研究工作,受到了忘年老友——革命家、教育家徐特立的关注。陈述回忆:

有一天,徐老(特立)到我家里来,谈了一会儿,要看看《辽史补注》,同来的还有中宣部的两位同志,前后翻着看了几段,说,“很好。和王先谦的《补注》并不相同,以后我替你



《辽史补注》手稿

设法印。”

陈述与徐特立早在1937年便已相识。当时徐特立奉中共中央之命,从延安到长沙任中央驻湘代表,开展统一战线工作。北方的一些机关、大学也纷纷南下,陈述随着中研院到了长沙,给陈寅恪先生当“临时助教”。有一次陈寅恪给临时大学讲南方民族“巴蜀蛮獠,溪俚楚越”,徐特立来了,三人便攀谈起来。自此以后,二人结成了忘年交,但很快各自离开。直到1949年,二人才又在新北京见面。(陈重《徐特立与陈述》)

1950年代初期,徐特立与陈述都住在西四,隔得很近,二人交往密切,“一起谈政治、讲历史,指出‘历史要为政治服务’。徐特立鼓励陈述多出历史研究成果,并推荐陈述到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工作”(《徐特立年谱》)。徐老关心《辽史补注》的工作,还写信与陈述讨论。比如陈家至今收藏的一封信徐特立来信(见《陈述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册》),是讨论“乱军”问题的。

陈述教授:

乱军资料奉还,乞察收。有不成熟的意见如下:

以《通志》的《氏族志》及《礼记》的《左传》的文献和南方现存的祠堂制,乱军只是利用旧的氏族公社的遗留形式,而内容仍然是私有财产的剥削

社会。是否正确,请审核为盼。
特立

1952年,陈述先生调到新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,次年一家人搬到了西郊,二人见面的机会渐少。1958年,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成立,陈述调任该机构任研究员。从到民族学院起,他的主要工作是配合民族识别、民族调查,编写民族史材料等,研究成果颇为丰硕,《辽文汇》《金史拾补五种》《契丹社会经济史稿》先后出版。补注《辽史》的工作随着新的研究进展仍在继续。

1967年,是陈述与徐特立的最后一次见面,九十高龄的徐特立仍然牵挂着《辽史补注》。陈述的儿女亲家周世钊,是徐特立在湖南第一师范时的学生、毛泽东的同班同学,新中国成立后在湖南从事教育工作。当时周世钊受到造反派冲击,毛主席邀请他到北京来,徐特立接他到家里住了两个月,也邀请陈述来见面。三人又谈起《辽史补注》,陈述当时正准备去河南干校,深感时间紧迫,可能无法再写了,难免沮丧。徐特立一再嘱咐:“你们一定要坚持完成《辽史补注》,以后要多来。”第二年,徐特立与世长辞,没能看到《辽史补注》的完成,设法出版的诺言也未及兑现。此时,这部巨著是否还有面世的一天,谁也不知道。

三

1971年6月,陈述先生被调到中华书局,接续冯家昇,承担《辽史》的点校工作。冯家昇的工作从60年代初开始,到1966年,完成了超过三分之二的标点和校勘记。后“文革”爆发,“二十四史”点校工作中断,直到1971年才得以重启。而冯家昇已于1970年4月去世,《辽史》便由陈述接手继续点校,陈述也由此从干校回到北京。陈述在撰著《辽史补注》时的长期积累,对《辽史》点校起到了学术支撑的作用,对冯家昇点校的初稿是一个有力的补充。

主持标点“二十四史”的,是顾颉刚先生。顾颉刚与陈述也是早在20世纪30年代便已相识。陈述的《金史氏族表》,邓之诚曾